

# 论阮元“西学中源”说的考据特色

钟玉发

(肇庆学院 旅游学院, 广东 肇庆 526061)

**摘要:**阮元为学继承由汉学院派戴震开创的训诂以明义理的考据学风,并取得巨大成就。他对天文历算等学问也予以关注,在肯定西学先进的同时,又力持所谓“西学中源”说。在他看来,西学与中学都源自中国古学,发明、阐扬中国古学才是应取的态度。他以“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对这一说法进行了论证,使之具有典型的考据学特色。

**关键词:**阮元;“西学中源”说;考据特色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8)01-0089-04

阮元(1764—1849)是清代中期著名考据学家,其学术思想博大精深,广泛涉及经学、史学、典章制度、金石以及掌故等方面。他还对于天文历算之学也予以了充分关注,不仅重视对科技史的研究,而且在肯定西学先进性的同时,又力持“西学中源”说。有学者认为,这是阮元作为封建士大夫为了传统的卫道需要而发议论。<sup>①</sup>但是,如果从当时学术界的治学风气以及阮元治学的一贯立场来看,他的这一思想又渗透着考据学特色,自有其必然性。

响深远。他也因此被称为学界之“山斗”。

在治学精神与方法上,他主要确守和阐扬了汉学院派戴震开创的考据以明古学、训诂以明义理的宗尚,“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sup>[2]547</sup>“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训诂之学,必自形声始。……由形声而得训诂,由训诂而得义理。”<sup>[3]48-49</sup>其治学兴趣和途径与当时盛行的考据学合流,因此走上了“治经必通训诂”之路。

这实际上也是整个乾嘉汉学诸人共同的治学途径。在以何时之说为“宗”的问题上,阮元表示应该“尊汉”,他说:“两汉经学所以当尊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sup>[4]248</sup>又推而上之,谓:“百世学者皆取法孔子矣,然去孔子渐远者,其言亦渐异。子思、孟子近孔子而言不异,犹非亲受业于孔子者也。”<sup>[5]36</sup>并认为:“万世之学,以孔、孟为宗。孔、孟之学,以《诗》、《书》为宗。学不宗孔、孟,必入于异端。孔、孟之学,所以不杂者,守商、周以来《诗》、《书》古训以为据也。”<sup>[6]卷首</sup>

清代中叶,学界尊经复古,普遍注重音训考据之学,所谓乾嘉考据学日丽中天,形成“家家许、郑,人人贾、马”<sup>[7]4</sup>的局面。出身于历史文化名城扬州的阮元自幼便受到这一学风的熏陶,所师从和交游的学者中,很多都是考据名家。阮元进士及第后,仕途十分顺利,历任“九省疆臣”。他亦宦亦学,不仅本人著述丰富,结集刻有《研经室集》,而且先后设立了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两所著名的书院,培育了大批朴学人才。又主持编纂了《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和《皇清经解》等大型经学著作,在清代学术史上影

然而,即便是孔子所删定的《诗》、《书》等也必有所本,故此阮元最终将其学归结为探究文字之“本义”,其言曰:“古圣人造一字必有一字之本义,本义最精确无弊。”<sup>[7]1016</sup>这就是说“字”之“本义”才是

收稿日期:2007-06-14

作者简介:钟玉发(1963-),安徽郎溪县人,肇庆学院旅游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清代思想文化史。

唯一可取法的。正因为如此,他强调说:“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sup>[18]187</sup>即以文字音训之学为途径,探究经典的变迁沿革,回到古代朴实的意义。

然而阮元又不同于仅作书斋式学问的一般学者,他在倾注心血从事音训考据的同时,积极主张学以致用,认为“实践之道,无非实践”。又由于他为学崇尚考据,故其经世思想具有浓烈的“稽古”特色,他曾指出:“稽古之学,必确得古人之义例,执其正,穷其变,而后其说之也不诬。政事之学,必审知利弊之所从生,与后日所终极,而立之法,使其弊不胜利,可持久不变。盖未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sup>[19]241</sup>

## 二

阮元力主学以致用,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他认识到了科学技术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因此于嘉庆四年(1799)组织编纂了我国第一部天文历算学史著作《畴人传》。该书凡46卷,记载上起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下迄清嘉庆年间的中国天文历法和数学家275人,后4卷作为附录记载西洋学者41人。不仅记述了我国历代天文历算学家的生平与学术成就,而且还收录了西洋学者和来华传教士的有关资料,并一一置评,展示了他对西学的态度和立场。

阮元本着“实事求是”的立场,肯定了“西学”之优长。他说:“地未恰测角大星在鹑尾宫二十三度,自是厥后,列星渐渐东行,中法言冬至西移,西人易以恒星东行之算,两者相提,西说较长。”<sup>[10]550</sup>又认为《几何原本》是天学初函中最好的一种,“不言数而欲能言数之理”,“非熟精度数之理,不能作此造微之论也。”并赞扬传自泰西的八线对数表“其用为至捷”。<sup>[11]555</sup>

因此,他对传播西学者如李之藻、徐光启予以赞赏,认为:“西人书器之行于中土也,之藻荐之于前,徐光启、李天经译之于后。是三家者,皆习于西人,亟欲明其术,而惟恐失之者也。……其有功于授时布化之道,岂浅小哉?”<sup>[12]390</sup>相反,他对不懂西学者则表示反感:“(魏)文魁主持中法,以难西学,……至谓岁实之数,不假思索,皆从天得,可以千载合天,自欺乎?欺人乎?其悠谬诞妄,真不足与较也。”<sup>[13]385</sup>

他赞赏西洋先进之“器”、“仪象”,说:“奇器之

作,专恃诸轮,盖轮为圆体,惟圆故动,数轮相触,则能自行。西人以机巧相尚,殚精毕虑于此。故所为自行诸器千奇万状,迥非西域诸国所能及。于此可见人心之灵,日用日出,虽小道必有可观。彼无所用心者,当知自愧矣。”<sup>[14]579</sup>又说:“西法之有验于天,实仪象有以先之也。”<sup>[15]595</sup>

阮元认为应该吸取先进的西学,并会通中西,他说:“是编(按指《畴人传》)网罗今古,善善从长,融会中西,归于一是。”<sup>[16]卷首</sup>

但是,阮元对当时部分人过度推崇西学又表示反对,并大力宣扬和反复论证在当时十分流行的“西学中源”说。他在评论江永之西学观时说:“慎修专力西学,推崇甚至……然守一家言,以推崇之故,并护其所短,恒气注术辨,专申西说,以难梅氏,盖犹不足为定论也。”<sup>[17]528</sup>又批评徐光启:“至谓利氏为今日之羲和,是何其言之妄而敢耶?”他认为中国天算史悠久,只是到了明代以后才因为种种原因而逐渐趋于落后,所谓“天下算数之学,吾中土讲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因此,“但可云明之算家不如泰西,不得云古人皆不如泰西也。”<sup>[18]568</sup>

阮元虽然肯定西学有其先进之处,但是又认为不能因此而非议民族科技文化成就,其原因就在于他考证认为“西法实窃取于中国”。他说:“西法实窃取于中国,前人论之已详。地圆之说,本乎曾子,九重之论,见于楚辞,凡彼所谓至精极妙者,皆如借根方之本为东来法,特审译算书时不肯质言之耳。”又说:“以勾股量天,始见于《周髀》,……欧罗巴测天专恃三角八线,所谓三角即古之勾股也。”<sup>[19]7</sup>“西法三率比例,即古今有术;重测即古之重今有;借衰即衰分之列衰;叠借即盈不足之假令;今之三角即勾股,借根方即立天元一……以此证彼,若符节之合。然则中之与西不同者其名,而同者其实。”<sup>[20]167-168</sup>阮元对来自西洋的钟表等物十分有兴趣,曾对自鸣钟进行过拆卸,研究后也认为:“自鸣钟来自西洋,其制出于古之刻漏。……非西洋所能创也。”<sup>[21]701</sup>

在他看来采用西法是“礼失求野”,使用西人是“天朝”宽宏大量的表现,曰:“夫欧罗巴极西之小国也,若望小国之陪臣也,而其术诚验于天,即录而用之。我国家圣圣相传,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设成心,即是一端,可以仰见如天之度量矣。”<sup>[22]589</sup>

阮元出于实用和实践的目的,重视研究天文历算问题,并对西学的先进性表示肯定,但是他又力持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反复论证西学源自中学,

而其根据就在于认为“西学”源自中国“古学”。在阮元看来,某些西法虽一时处于领先的地位,但那也不过是因为西人受到中国“古学”的影响而加以改进、发扬,其精神实质是中法之须余。故此,他批评说:“古今为术者,三统以来不下七十余家。……后世相沿遵用,又几忘其创造之功”,“读者因流朔源,知后世造术密于前代者,盖集合古人之长而为之,非后人之知出古人上也。”即认为,今人只能综合采集古人之术,而非今人智力高于古人。所以,他又驳斥说:“近来工算之士,每据今人之密,而追咎古人,见西术之精,而薄视中法,不亦异乎?”<sup>[16]卷首</sup>

其实,阮元不仅认为西学源自中国古学,而且认为中土现有之法也皆古已有之,他曾说:“中土推步之学,自汉而唐而宋而元,大抵由浅入深,由疏渐密者也。乃多禄某生当汉代,其论述条目,即与明季西洋人所称,往往相合,岂彼中步算之密,固自昔已然耶?然考西人旧率,即用后汉四分法,是则彼之立术,亦必先疏后密,而谓多禄某时其法之详备已如是,毋亦汤若望辈夸大其词,以眩吾中国,而徐(光启)、李(之藻)诸公受其欺而不之悟也。”<sup>[23]53</sup>后来,他更进一步发挥了这一层意思,说:“自西人尚巧算,屡经实测修改,精务求精,又值中法湮替之时,遂使乘间居奇,世人好异喜新,同声附和,不知九重本诸天问,借根昉自天元,西人亦未始不暗袭我中土之成说、成法,而改易其名色耳。”并论证说八线对数源自元朝《授时历草》。<sup>[24]卷首</sup>

阮元还分析说,中国古代天文历算之学发达,之所以到明清之际相对落后于西方,是因为“后儒”轻视、不屑从事所造成。他说:“自汉所来,如许商、刘歆、郑康成、贾逵、何休、韦昭、杜预、虞喜、刘焯、刘炫之徒,或步天路而有验于时,或著算术而传之于后。凡在儒林类能为算后之学者,喜空谈而不务实学,薄艺事而不为,其学始衰。降及明代,寢以益微,间有一二士大夫留心此事,而言测圆者不知天元,习回回法者不知最高,谬误相仍,莫能是正。步算之道,或几乎息矣。”<sup>[20]681</sup>

因此,西学与中学都源自中国古学,菲薄古人的做法不自量力,而发明、阐扬中国古学才是应采取的态度。

阮元以“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肯定西学之优长,认为应该吸取其先进之处,融会中西,但又反对过度扬西抑中,其根据就在于他认为西学源自中国

古学。他在论述这一主张的时候,进行了颇为详细的考证,使之具有典型的考据特色。

### 三

阮元编纂《畴人传》,钩沉索隐,将古代历算史料荟萃于一书,加以考实和论证,并客观评论得失是非,其目的当然不仅仅限于恢复和阐扬古学。在他看来,既然西学源自中国“古学”,那么学习西学实际上就是恢复中国古学。他说:“学者苟能综二千年来相传之步算诸书,一一取而研究之,则知吾中土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彼不读古书,谬云西法胜于中法,是盖但知西法而已,安知所谓古法哉?”<sup>[18]568</sup>断言“西术之密,亦密于今耳,必不能将来永用,无复差忒”,期望中国历算学者“精益求精,期于至当,则其造诣当必有出于西人之上者……精算之士,当知所自立矣。”<sup>[22]589</sup>这就是说,西学实窃取于中国古学,国人不应对本位文化妄自菲薄,而应提高文化自尊与自信、发掘古学、振兴科技、强大自我。

然而,就阮元所一贯坚持的考据学旨趣而论,“西学中源”说又存在着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他没有也无法回答诸如:中学是何时经由何种途径、如何传入西方并为西人所接受等。他曾在学海堂中专门就此作过“策问”:“今大、小西洋之历法来至中国在于何时?所由何路?……元之《回回法》,明之《大西洋新法》如是古法,何以不来于唐《九执法》之前?《九执法》又自何来?且西洋又何以名借根方为东来法也?”<sup>[25]1067-1069</sup>但是,不仅《学海堂集》中未发现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论文,而且阮元本人对此也没有考证详实的可信说法。惟一可见的说法是在《畴人传》凡例中提及《史记·历书》所载“畴人子弟分散”一语,但年代久远,无从考察散至何处,而且即使“分散”亦未必散到西方各国。而且这一说法由来已久,阮元在这里只是习惯性地予以祖述,并无确凿的考据。因此,“西学中源”说是建立在臆度与想象之上的,不免失之武断。

其实,阮元本人也曾因缺乏可信的证据而对这一说法表现出了一些犹豫,他曾在《畴人传·蒋友仁传论》中坚决反对日心地动说,但是后来他的态度又有所改变。他在为罗士琳所编《续畴人传》所作序中说:“元且思张平子有地动仪,其器不传,旧说以为能知地震,非也。元窃以为此地动天不动之仪也。”

然则蒋友仁之谓地动,或本于此。”给日心地动说披上了“中源”的外衣,把张衡的候风地动仪说成是“地动天不动之仪”,未免过于牵强,因此他又犹豫道:“或为暗合,未可知也。”<sup>[24]卷首</sup>

另外,阮元还不能正确对待西学的发展和进步,认为西法屡变,缺乏可靠性,从而陷入保守和退缩的境地,认为最好是遵守经义,以不变应万变,他说:“古推步家,齐七政之运行,于日躔,曰盈缩;于月离,曰迟疾;于五星,曰顺留伏逆,而不言其所以盈缩、迟疾、顺留伏逆之故,良以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故但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阮元认为应该坚守古法,只可言其“所当然”,而不可强求其“所以然”,这样就可以做到“终古无弊”。<sup>[26]609-610</sup>这种态度与前述他对“西学”所持之进步观又自相矛盾,说明他在历史的真实与科学的真实发生冲突之际,放弃一向标榜的“实事求是”的准则,趋向于保守和退缩,而这又恰恰违背了考据学的治学立场,是他受到传统观念和时代局限的必然结果。

注释:

①参见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008页;黄爱平:《从〈畴人传〉看阮元的西学思想》,《清史研究》,1989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长沙:岳麓书社,1998.

[2]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M]//研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  
 [3]阮元.冯柳东三家诗异文疏证序[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4]阮元.国朝汉学师承记序[M]//研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  
 [5]阮元.曾子十篇注释序[M]//研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  
 [6]阮元.诗书古训序[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7]阮元.释敬[M]//研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1.  
 [8]阮元.研经室集自序[M]//研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  
 [9]阮元.汉读考周礼六卷序[M]//研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  
 [10]阮元.地未恰传论[M]//畴人传.北京:中华书局,1991.  
 [11]阮元.欧几里德传论[M]//畴人传.北京:中华书局,1991.  
 [12]阮元.李之藻传论[M]//畴人传.北京:中华书局,1991.  
 [13]阮元.魏文魁传论[M]//畴人传.北京:中华书局,1991.  
 [14]阮元.邓玉函传论[M]//畴人传.北京:中华书局,1991.  
 [15]阮元.南怀仁传论[M]//畴人传.北京:中华书局,1991.  
 [16]阮元.凡例[M]//畴人传.北京:中华书局,1991.  
 [17]阮元.江永传论[M]//畴人传.北京:中华书局,1991.  
 [18]阮元.利玛窦传论[M]//畴人传.北京:中华书局,1991.  
 [19]阮元.荣方、陈子传论[M]//畴人传.北京:中华书局,1991.  
 [20]阮元.里堂学算记序[M]//定香亭笔谈.北京:中华书局,1991.  
 [21]阮元.自鸣钟说[M]//研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1.  
 [22]阮元.汤若望传论[M]//畴人传.北京:中华书局,1991.  
 [23]阮元.多禄某传论[M]//畴人传.北京:中华书局,1991.  
 [24]阮元.续畴人传序[C]//罗士琳.续畴人传.北京:中华书局,1991.  
 [25]阮元.学海堂策问[M]//研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1.  
 [26]阮元.蒋友仁传论[M]//畴人传.北京:中华书局,1991.

责任编辑:曲晓红

## Textual Research's Characteristics of Ruan Yuan's Thought on "The Theory of Western Learning Being of Chinese Origin"

Zhong Yufa

(School of Tourism, Zhaoqing University, Zhaoqing526061, China)

**Abstract:** Ruan Yuan (1764-1849) was deeply affected by the Schools of The Han Learning in Anhui which originated from Dai Zhen(1723-1777), and made considerable study's achievements. He also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 ancient astronomy and arithmetic of China. While affirming the advance of "Western Learning", Ruan stood for "The Theory of Western Learning Being of Chinese Origin". According to his view, both Western Learning and Chinese Learning originated from ancient China. He proved this kind of thought with the textual research's method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which was very popular at that times.

**Key words:** Ruan Yuan; thought on "The Theory of Western Learning Being of Chinese Origin"; the textual research's characteristics